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博 学 系 列

西方史学史

(第二版)

张广智 / 主著



博
学
·
史
学
系
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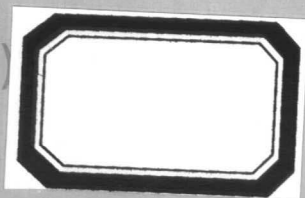


张
广
智
主
著
出
版
社



西方史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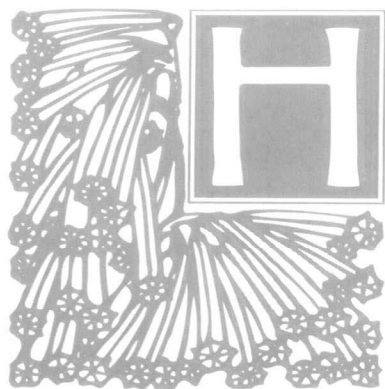
(第二版)



张广智 主著
张广智 撰稿
陈新



博
学
·
史
学
系
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史学史/张广智主著. —2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7

ISBN 7-309-04055-4

I. 西… II. 张… III. 史学史-西方国家 IV. 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52918号

西方史学史(第二版)

张广智 主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吴仁杰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6.75 插页 2
字 数 451千
版 次 2004年7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书 号 ISBN 7-309-04055-4/K·131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张广智，1939年生。籍贯江苏海门，自幼在上海求学。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即师从耿淡如先生，完成了西方史学史方向的研究生学业。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来

教学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侧重于自古典的至现当代的西方史学，兼及中外（西）史学之间的交流与比较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出版史学论著多种，其中主要为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如《西方史学概论》等；发表论文多篇，其写作旨趣也集中于上述方面，如《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等。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统阐述起自古希腊迄至现当代的西方史学，纵贯西方古典的、中世纪的、近代的和现当代的史学发展历程。古典部分，阐述古代希腊罗马史学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中世纪部分，阐述欧洲文艺复兴以前的基督教神学史观，并对其作出历史评价；近代部分，阐述西方各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涉及各种史学流派；现当代部分，阐述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主要是西方新史学的发展进程及其在当代的新趋势。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环境中考察西方各个时期的史家、史著、史学思潮和流派等，揭示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演进与变革，从而阐明西方史学思想的发展概貌。

本书先后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供高等院校历史学专业与相关系科教学使用，也可供历史爱好者和历史研究者参考。

导 论

史学史是历史学科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即所谓“历史的历史”。史学史以历史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探究历史学科的发生与发展史,揭示它的演变规律,预测它未来的发展方向。

据此,西方史学史以总结与评价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为宗旨,研究西方史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研究人们(主要是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所作出的种种思考,从而在西方历史学发展的长河中,疏凿源流,抉隐钩沉,辩证因果,探求原委,以寻取西方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一般说来,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包括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史学方法论等,西方史学史亦不例外。但在这几者之中,应当突出史学思想的主导地位。就我们看来,史学思想应当论及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认识,它大体表现为历史观;还应当论及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这门学科自身的认识,一般称之为狭义的史学理论(广义的史学理论它还可以包括历史观)。简言之,历史学家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与解释,应当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从西方史学发展的大势来看,大体在20世纪以前,西方史家多致力于研讨历史发展的进程问题,因而如历史倒退论、历史循环论、历史进化论等都一一面世。众多历史学家(包括历史哲学家)的论见,各自从一个方面触及历史科学的某些根本问题,其中不乏闪光的睿智和启人肺腑的历史认识,为人类思想宝库留下了许多有益的资料。20世纪以来,在风气大变的西方史学的发展中,注重探讨历史学自身的问题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倾向,于是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潮纷起,诸说并存,互争雄长,看来是与这种重视对历

史学自身进行反思的观念有关的。这一史学情景,大别于20世纪以前的西方传统史学。

我们讲授西方史学史,就应当突出上述这些内容。当然,西方史学史不等同于史学思想史(或历史哲学史)。在这里,值得留意的一点是,不能把西方史学史等同于历史编纂史,不能把西方史学史搞成史家评传或书目答问之类。正如当代英国史学史家巴特菲尔德所指出的:“如果人们把史学史归结为一种纯粹的提纲,如同另一种的‘书目答问’,或把它编纂成一种松散的编年形式的历史学家的列传,那么它将是一门很有限的学科了。”^①传统的史学史作品,似有一种偏重于历史编纂学的倾向。在我国,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曾饮誉史坛30年之久,对后世中西史学史的编纂甚有影响,但此书正如作者所言:“只就过去三千年间之若干史家、史籍加以编排叙述,殊不足以说明祖国史学发展演变之主流所在。”^②金氏的体例明显地受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类书目解题的影响。因此,这种书目答问或史家列传式的写法在我国是有历史传统的。在西方,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巴恩斯的《历史编纂史》,还是40年代初出版的另一美国历史学家汤普森的《历史编纂史》(中译为《历史著作史》),都十分明显地存在把史学史的研究等同于历史编纂史的倾向,前书尤甚。

史学史的研究是一种承上启下的工作。学习西方史学史,对历史学科的自身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历史学家是为历史作总结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学史家就是为历史学家做总结。因此,史学史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对史学的反思,为后人提供借鉴,指明方向,造就自觉的史学工作者。倘若舍弃这种对史学的反思,历史的研究只能每天从零开始,那也就不会有历史学的任何进步了。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己任的中国历史科学工作者,如果漠视自身学科发展的历史,缺少这种必要的知识与理论素养,就不能担负起建设现代中国新史学的重任。而对于高等学校的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们来说,西方史学史更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必修课。

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19世纪中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产物,也是“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

① 巴特菲尔德:《人类论述它的过去:史学史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英文版,第14页。

②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重版前言,中华书局1962年新版。

切有价值的东西”^①的结果。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之前,西方史学经历了长期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史学遗产。据我们初步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广泛接触或研究过从古典时代到近代西方各国的著名史家,从中吸收思想资料,作为其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理论来源。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产生之后,它必须也应当面对现代人类在历史学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变革,包括积极地吸取西方史学在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最新成果。我们以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应当“吸收和改造”现代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就像它创立时那样。因此,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对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尤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是颇有助益的。

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对于推进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祖国历史悠久,史学著作浩如烟海,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焕发过夺目的光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批判地继承先辈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这是中国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的职责。但是,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无疑也要借鉴与吸收西方史学。因此,同样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下,批判地继承自希罗多德至年鉴学派等一切有价值的西方史学遗产,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只要采取正确的态度,我们就可以从引进的西方史学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成为推进我国史学现代化的一种借鉴。

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还为我们了解与认识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要走向世界,就需要了解世界。不仅要了解世界的今天,也要了解世界的昨天与前天。因此,我们在审视风云变幻的当代世界的同时,也应当把目光投向历史,开拓新的视野,以便从更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寻求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的理想方案。不过时下历史学家多致力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去探求它,而往往忽略从历史学自身这一视角去认识它。从政治的、经济的与社会的发展进程去研究西方历史,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倘若舍弃了后者,是无助于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西方的历史和现实的。这确如何兆武所说,“对于任何一个历史工作者来说,对以往历史学的理解,其重要性是绝不亚于对历史本身的理解的重要性的。”^②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② 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见唐纳德·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译序,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

在世界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西方史学同中国史学一样,也有源远流长的传统。西方史学自古希腊发端迨至今日,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根据我们的认识,它大体可分成如下四个很明显的又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

1. 古典史学,即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从追溯神话与史诗的前希罗多德时代算起,至公元5世纪“古典世界”的终结,西方古典史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形成了颇具影响的西方史学的诸多优良传统,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中世纪史学。从公元5世纪开始,西方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至14世纪初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其间古典史学的传统中断,基督教的神学史观制约与束缚了史学,史学的发展相对说来显得比较迟缓。

3. 近代史学。由于时代的进步,西方史学自14世纪初开始加快了它的进程,人文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等相继发展起来,至19世纪史学的兰克时代,已日趋成熟,终于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4. 现代史学。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萌发,日益冲击着西方传统史学的堤坝。大体说来,我们把现代西方史学等同于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与演变,这是西方新史学不断成长壮大并与传统史学相抗衡又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过程。不过,西方新史学真正成气候,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其时的史学更多地体现出当代的特色了。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西方史学的嬗变中,各种史学思潮交替出现,诸多流派此消彼长,文献浩瀚,史家辈出,形形色色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像走马灯似地登上了史坛。面对这样一部西方史学发展的历史长编,需要找到一条主线索。这一答案来源于西方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蕴涵于



历史女神克利奥

西方社会的深刻变革之中。宏观地看,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史学史经历了如下五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对此,我们可以作简略的表述。

第一次转折,西方史学的创立,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时的古希腊时代。在绵亘近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中(公元前492—前449年),同仇敌忾的古希腊人以弹丸之邦,最终击败了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此战不仅促进了古希腊城邦制社会的繁荣,而且刺激了他们对古老东方文化的巨大兴趣,希腊编年史由此进入“古典时代”。这个时代,也是古希腊人理性觉醒的时期。新的哲学思想与学说,尤其是普罗太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对传统的奴隶主贵族的陈腐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史学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变革时代中诞生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历史学在西方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与尊严,并由此酿就了古典史学的兴旺局面。后来,古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人的史学遗产,古典史学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一千年之久。

第二次转折,发生于公元5世纪前后,西方史学从古典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基督教的神学史观。公元476年,曾经是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倾覆,这在欧洲编年史上是一个典型的事件,它标志着西方社会奴隶制的终结与封建制的开始。基督教史学,特别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企图用基督教的神学观念改造古典史学的人本观念。经过基督教史家重新塑造的历史理论,不仅在整個中世纪时代,而且对整个后世的西方史学都发生了长久的影响。但总体上看,由于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被基督教僧侣们所垄断,史学的发展速度缓慢,史学沦为神学的附庸,这一情况也持续了将近一千年。

第三次转折,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14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不仅要用火与剑为自己开拓道路,也要用笔和舌为自己的合理性辩护,从意识形态上向封建主义旧文化发起挑战。这后一方面便是文艺复兴——一次在西方历史上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发生伟大转折的思想文化运动。其时,欧洲思想家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使历史学“重新定向”,这个任务是由当时的一批人文主义史家来完成的。他们复兴了古典史学的传统模式,并在新时期中发展了这种传统,史学思想又一次把人置于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人文主义史学的出现,揭开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序幕。

第四次转折,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资产阶级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尤其是通过产业革命促进了西方社会的深刻变革,近代自然科学

的长足进步又为这种变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到了19世纪,更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高歌猛进的时代,于是历史的进步观念与乐观主义的文化氛围达于极盛。历史学高度专业化,并被视为一门独特的科学。兰克及其学派应运而生,并进而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主流。但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社会的动荡引起了思想界的困惑与不安,尼采的失望便是这一时期西方社会与思想界的一种典型的反映。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更是极大地震撼了西方世界,它唤醒人们丢弃昔日的幻想,正视正在变化的现实。在史学界,传统史学的某些基本观念重新受到了审视,19世纪末那场德国的“新史学派”与传统史学的论争,随后引起了20世纪西方诸国新史学思潮的勃发,历史观念从思辨的向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转变,就是基于这一现实的社会背景。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史学仍受到传统史学的强大影响,但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工作方向产生了与日俱增的怀疑,史学变革的新方向已不可阻止,史学研究的领域发生了重大的转移,兰克的史学传统受到了有力的冲击。

第五次转折,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从此开始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史学变化的速度也加速了。在古代,这种转折往往要以千年计,到了近代,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西方史学的变革,其间也有四五百年,但在20世纪,时间只过了半个世纪,史学的重大转折就发生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代西方史学又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可见,历史学的新陈代谢同大千世界一样也是不可抗拒的:顺时代潮流者兴,逆时代潮流者衰。昔日的传统史学,倘要在现当代的新史学潮流中立足于史坛,就需要审时度势,博采众长,另辟蹊径,寻求出路。如果抱残守阙,就会陷入困境,并将为新的历史观念与方法所取代。历史学的新陈代谢是如此,其他学术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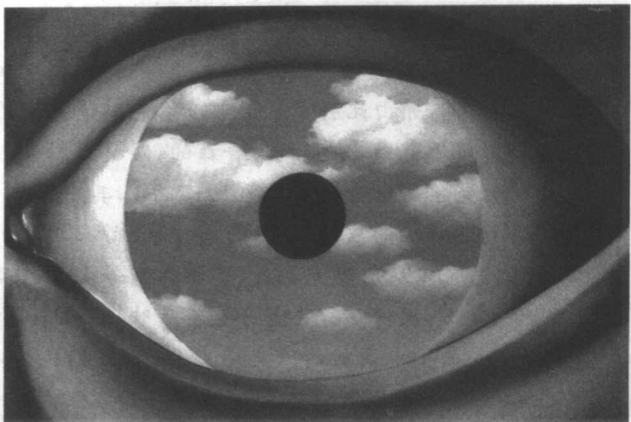
三

了解与研究西方史学史的历史,对于史学史自身的发展和史学研究工作的开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白寿彝说史学史可以从神开始^①,倘此论可立,则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的童年》,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关于“史学史之史”等问题,可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史学史之史”也可以从这开始追寻。以西方史学而论,我们的确可以从古代希腊罗马找到先贤对史学工作的最初思考,从荷马到波里比阿,从赫西俄德到卢奇安;但那是零碎的、偶然的、不自觉的,即使公元2世纪时卢奇安《论撰史》这篇杰出的史论,也不可能是对历史学的自觉的反思,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使然。

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自身历史的关注,在西方始于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时代,这是西方史学由传统步入近代的“开闢的大关键的第一幕”^①。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法国一些历史学家察觉到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和人文主义史学的缺陷已阻碍了史学的进步,于是相继提出了一些新见。这些史家中有鲍杜安(François Baudouin, 1520—1573年)、勒卢阿(Louis Le Roy, 1510—1573年)、让·波丹(Jean Bodin, 1530—1596年)、波普利尼埃尔(Voisin de La Popeliniere, 1540—1608年)、帕基埃(Etienne Pasquier, 1521—1615年)等。波普利尼埃尔在1599年出版了《史学史》一书,成为西方史学史上把历史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开山之作,但此书不过是一些很松散的史家传记集。此后,仿照此书体例的续作,也多是历史学家的传记汇编。



什么是历史?

启蒙运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也为史学自身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18世纪后期德国哥丁根学派不仅在西方史学史上是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学派,而且这一学派的史学家对史学史的认识也有了进步。他们中如伽特勒、施洛塞尔等人,主张研究历史也需要探究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情况,并把这种探究同历史学的相关辅助学科的进展和通史研究等结合起来。哥丁根学派为19世纪以尼布尔、兰克为代表的批判史学奠定了基础。

1824年,兰克发表了《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在该书附录《对近代史家

^① 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见《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译序,第3页。

的批判》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兰克运用尼布尔处理早期罗马史料的批判方法,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史家马基雅维里与圭恰迪尼的著作进行了分析批判,指出他们的错谬。这篇文章发表引起了西方史学界的普遍赞赏与高度评价,它问世的1824年也被学界视为“史学的批判时代的开端”^①。兰克及其学派所奠立的史学批判原则,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史学史的发展。

在兰克之后,19世纪英国实证主义史学家巴克尔在《英国文明史》中,比兰克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史学史的任务,指出每一学科的研究者都应当熟悉本学科自身的历史,其作其论进一步推动了史学史的发展。继巴克尔之后,在德国出版了荷拉维茨的《德国史学史纲要》(1865年)、维葛勒的《文艺复兴以来的史学史》(1885年),在英国出版了弗林特的两部有关欧洲历史哲学的作品(1874和1894年)等。

进入20世纪,史学史研究更有发展,这方面的作品不断见诸于世。1911年,瑞士傅埃脱的《近代史学史》刊行。1913年英国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问世,这是一部对19世纪西方史学作出系统总结的权威之作,并由此引发了两部有名的史学史著作的出版,即前文已提及的巴恩斯的《历史编纂史》和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此外,还有意大利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1915年),其中第二编专论史学史;德国里特尔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年)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史学史之史”,可以从巴勒克拉夫、伊格尔斯等人的作品中了解其梗概,而且时贤论述不少,本教材在有关部分也有反映,在此不再赘述。

关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我们认为,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简述如下。

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借助日本的间接介绍到直接接触西方史学原著,从翻译作品到开始撰写著作,这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草创时期。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为闭塞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近世西方史学的最初消息,我国读书界人士开始“粗闻西洋近世新史学之要义”。同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介绍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基佐的《欧洲文明史》。随后,西方史家兰克、格林、伯伦汉、瑟诺博斯和巴克尔等人,也逐渐为我国读者所知。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逐步发展。当人们把眼光投向过

^①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79页。

去,回顾西方史学史在中国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时,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如同晨光初露之际,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就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研究西方史学了。从1920年起,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了《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尤其是他编纂的《史学思想史讲义》^①有很多发人深省的见解,称得上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粗具规模的西方史学史著作。当然,这还是初步的,有些论断也未必精当。但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李大钊为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开辟的途径及其所奠立的原则,都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在这一阶段,留学欧美成为新的时尚,留美归国的学者中,胡适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治史方法;特别是何炳松为输入美国鲁滨逊新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五四前后的中西史学交汇中,他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与梁启超一起被称为那时“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

从20世纪20年代中叶至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又有一些进展,尤其是大量引进了西方史学理论,在30年代前后形成了一个高潮。属于这类作品并译成中文在当时出版的有:鲁滨逊的《新史学》(1924年)、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斯的《史学原论》(1926年)、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塞格利曼的《经济史观》(1928年)、弗林特的《历史哲学概论》(1928年)、施亨利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1930年)、班兹(即巴恩斯)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弗领的《历史方法概论》(1933年)、史高特的《史学与史学问题》(1934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1936年)、巴克尔的《英国文化史》(1936和1946年)、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1937年)等,这些著作主要阐述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问题。另外,还有不少是介绍西方史学史的,如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巴恩斯的《史学史》(1930年)、巴恩斯的《西洋史学进化概论》(1932年)等。

我国学者在当时撰写的史学著作中,也涉及了西方史学史。如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用了将近两章介绍西方史学史。朱谦之的《历史哲学》(1926年)、《历史哲学大纲》(1933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1936年)、《孔德的历史哲学》(1941年)等,虽然讲的是历史哲学,但也对西方历史学家尤其是若干近代西方史家作过一番深入的探讨。在当时出版的《史地丛刊》、《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等刊物上,也经常刊有介绍西方史学的文章。不过,国人撰写的完整的西方史学史著作,此时尚付阙如。

^① 《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在1949年前,西方的兰克学派对中国史坛具有重要的影响。以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傅斯年为首,明确提出了“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成为中国“新考据学派”的主将。傅氏引进兰克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也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他本人被学界称为“中国的兰克”,这是中西史学汇合在中国的一种反响^①。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战国策派”的史家们曾介绍过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当时也很有影响^②。

总之,在这近半个世纪里,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当不可忽视。

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这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曲折发展与遭遇坎坷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界发生了一个大转变,即从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当时苏联的史学观点和历史著作被大量介绍进来。我国史学界从苏联那里学到了一些有益的内容,但也受到了教条主义的影响^③。从1954年批判胡适到1958年“史学革命”,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从表面上遭到了批判,实际上只是以政治否定方式来取代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工作仍十分薄弱。

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举步维艰。在整个50年代,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者寥若晨星,只有少量的文章和译文在当时的《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丛》及《外国史学研究动态》等刊物上发表,它们给读者介绍的西方史学知识是支离破碎的,也是不够确切的。

这一阶段,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是不是也有“热”起来的时候呢?有的。那是在60年代初期,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确实“热”了一阵子。虽则是短短的几年,但成绩还是可观的,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西方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被提到议事日程。当时,就史学史学科的对象、任务及分期等问题,一时在全国形成了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好局面。1961年底,为贯彻高教部关于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与会者充分认识到外国史学史(主要为

^① 参见张广智:《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载《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

^② 参见张广智:《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载《复旦学报》,2004年第1期。

^③ 参见张广智:《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载《社会科学》(沪),2003年第12期。

西方史学史)的重要性,一致认为应当把它列入高等学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并决定由复旦大学耿淡如先生主持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①、齐思和的《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②、吴于廑的《论西方古今两个“客观”史学家》^③等,就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发表的。而它们的问世,又转而推动了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其二,西方史学史在高等学校历史系的教学中得到了应有的地位。不少学校根据高教部的有关要求,开设了“西方史学史”课程,并把它作为历史系学生的必修课。以复旦大学历史系为例,笔者就是在那时接受了比较系统的西方史学史的学习与训练的。从1961年开始,耿淡如先生一面执教,一面坚持翻译西方史学资料,积极编写教材。1964年,他又招收了国内首批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直至“文革”来临,这些工作都被迫中辍。

其三,出版了不少有关西方史学的译著,西方古典名著《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塔西陀、阿庇安、汤因比、斯宾格勒等西方史家著作的全译本或选译本陆续问世。苏联学者康恩等撰写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等书在1961和1962年出版。吴于廑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的出版,也为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

如果没有后来“文革”的浩劫,我们本可以把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的建设工作做得更好些。但“文革”一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把兰克作为“靶子”,很快地延伸到西方史学史乃至整个西方文化领域,从此,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被打入冷宫,时间长达十余年之久。

第三阶段,从1978年至今。这是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逐步繁荣与转型时期,也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最为活跃与取得成绩最多的时期。对此,可参见作者的《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一文^④。

四

史学史是一种学科史,从门类来分,属于专业性的学术史。它的研究方

① 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

② 载《文史哲》,1962年第3期。

③ 载《江汉学报》,1963年第6期。

④ 载《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法与其他学科的学术史相同。研究西方史学史也应如此。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历代西方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正如前述,它应包括史家对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认识(历史观),也应包括对历史学自身的认识(狭义的史学理论)。特别要研究历代重要的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因为他们往往以其高远的史学思想,或奠立一个史学流派(如兰克),或创立一种史学新范型(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足以影响几代人,乃至在一个长时段中对史学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西方历史学家所处的历史环境,研究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因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化,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要研究社会转型与历史转折时期的史学思潮,研究这种史学思潮的特点及走向,研究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趋向,如近代初期人文主义史学思潮,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思潮等。



历史之路

的法国年鉴史学派等。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在西方史学的流变中作出动态的考察,即对西方的某一史家、某一作品、某一流派的研究,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唯其如此,方能顾及整体,全面考察;纵横比较,上下连贯;透过现象,洞察本质。如19世纪50年代前后的英国史家托马斯·卡莱尔的史学思想的变化,便是一显例。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开拓视野,扩展知识领域,即不能把它当作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要把它看作全部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部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西方史学流派,研究它们的过去与现在,繁荣与式微,成就与问题。特别要研究那些重大的史学流派,研究体现某一时代史学发展潮流与方向的史学流派,因为一个史学流派的发展史,往往能折射时代的风云,反映社会的转折和政治、经济的变化,更可发现文化的流程,如20世纪风行不衰